

世界格局·分歧·理论瓶颈·突破口

——三论渤海国历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张高

(牡丹江师范学院 历史系, 黑龙江 牡丹江 157011)

[摘要] 在渤海国研究一些重大问题上, 国内、外学者存在严重分歧。对渤海国研究如何深入的问题, 笔者认为, 除将渤海国研究纳入“渤海学”范畴外, 必须解决渤海国研究的“瓶颈”——研究理论与方法论问题, 找到渤海国研究的突破口。

[关键词] 渤海国研究; 世界格局; 分歧; 理论瓶颈; 突破口

[中图分类号] K28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3-6121(2011)04-0045-03

一、渤海国研究: 世界格局

1998年, 中外学术界分别举行了渤海国建国1300周年纪念活动。1300余年来, 中国一些学者或者官员兼学者(例如张建章)对渤海国研究高度重视, 他们的研究在20世纪前尽管是断断续续地进行, 但他们是研究渤海国最早、最权威的人。国外学者对渤海国的介绍、研究也比较早, 古代日本、朝鲜的史籍中有一些关于渤海、日本、渤海、新罗关系等方面的记载。渤海国灭亡后, 辽在渤海故地建立了东丹国。至元代, “渤海”成为汉姓八种之一, 此后, “渤海”不见中国史籍记载。渤海国似乎成了“谜中王朝”。就连渤海国都城上京龙泉府这么个世界东方大都市遗址, 至19世纪末即清末, 才陆续被中国人正名为“渤海上京”, 而不是“金上京”。于是, 几乎中断了数个世纪的渤海国研究逐渐热起来。

在国外, 18世纪末, 朝鲜出现渤海史研究的第一次高潮。20世纪初, 日本兴起研究渤海国的热潮。20世纪20年代以来, 苏联加快了研究渤海史的步伐。二战后, 朝、韩学者加紧研究渤海国^①, 20世纪下半叶, 又有美、德、英、加等国学者加盟。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 渤海国研究的世界格局大体是: 以中国学者为主, 日、俄、韩、朝、英、德、美、加等一些东、西方国家学者为辅。在东北亚, 以中国为中心; 在世界, 以东北亚为中心。这是“一个中心(中国)、几个次中心(朝、韩、俄、日等)”的世界格局。

二、渤海国研究: 分歧

在现代、当代, 在国别史研究上, 一个大国属国的历史同时被三、四个国家的学者纳入本国史学体系的案例, 似乎仅有中国唐及五代时期的渤海国, 这是一个十分奇特的国际学术研究现象。究其原因: 这三、

四个国家的学者在渤海国一些重大问题研究上存在严重分歧, 这些历史问题很敏感, 如果对历史问题不能进行科学的学术研究, 容易与现实的政治问题相混淆, 影响双边乃至多边国际关系。我们可以将渤海国研究的分歧主要概括为: 史学体系; 族属、族源; 国家主权归属, 边疆; 民族文化等问题。

(一) 史学体系

关于史学体系问题, 按照正常的思维和逻辑, 渤海国是中国的“国中之国”、“国中之州”, 渤海国历史当然是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 渤海国历史当然属于中国史学体系。中国史书两《唐书》等关于渤海国历史的记载是明证。对此, 在18世纪末以前, 并没有周边国家的学者持有异议。产生关于史学体系问题分歧的起点, 是18世纪末李朝后期朝鲜学者开始将渤海国历史从中国史学体系中分离出来, 将其纳入朝鲜史学体系。柳得恭在其《渤海考》一书中, 首提“南北国时代”论。二战以后, 韩国一些学者重提“南北国时代”论, 其代表人物有孙晋泰、李龙范、李佑成等。当然, 在韩国也有一些学者强烈反对把渤海国历史纳入朝鲜史学体系, 例如: 大思想家李瀾。

1962年以前, 朝鲜学者的论著还没有“南北国时代”论观点, 例如朝鲜科学院历史研究所1956年出版的《朝鲜通史》一书。但1962年以后发表、出版的论、著却将渤海国历史纳入朝鲜史学体系, 把渤海国视为朝鲜“南北国时代”的北国。朝、韩学者在确认是高丽还是新罗为朝鲜史上的统一王朝这个问题上, 观点并不是那么一致的^①。

20世纪60年代, 与朝鲜学者在渤海国问题上的观点发生类似重大变化的还有苏联学者奥克拉德尼科夫。他在1960年还认为: 中国是苏联远东地区远

[收稿日期] 2011-04-17

[作者简介] 张高, 男, 牡丹江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 主要从事渤海文化研究。

古文化的故乡^①，但到1964年，他却又提出了远东“文化独立性”观点^①。1968年，苏联学者沙弗库诺夫在其《渤海国及其在滨海边区的文化遗存》^①一书中，更提出了渤海国“独立”论。很明显，20世纪60年代以后，苏联学者把渤海国历史纳入了俄罗斯-苏联史学体系。在世界史学史上，某个国家的学者公开地把世界史学界公认的一个相邻大国的史学体系单方面予以改变的案例，还十分罕见。

(二) 族属、族源，国家主权归属，边疆

不同国家学者在渤海国族属、族源，国家主权归属，边疆问题上的分歧，其核心是国家主权归属问题。

族属、族源。在渤海国时期，在渤海国灭亡以后几个世纪，中国以外的学者对建立渤海国的主体民族是靺鞨族，其领导人是高丽遗民，因为大祚荣是靺鞨族的祖先可以追溯到肃慎族，基本上不存在分歧。20世纪或早在19世纪末产生的分歧，是与关于史学体系问题的分歧密切联系的。朝、韩学者的“南北国时代”论是这样，苏联学者的渤海国“独立”论也是这样，例如：朝、韩一些学者说：建立渤海国的主体民族不是靺鞨族，是朝鲜族的祖先——高丽遗民，因为大祚荣不是靺鞨族，是高丽遗民^①。因此，渤海国是高丽遗民的“继承国”。

下面的“逻辑”便是：主体民族高丽遗民建立的渤海国，其史学体系属于朝鲜史学体系，其国家主权归属问题就不成问题了。例如：苏联学者的渤海国“独立”论。它既否定建立渤海国的民族是高丽遗民，亦否定建立渤海国的民族是靺鞨族，提出：建立渤海国的民族是苏联远东地区的远古民族通古斯人。这样，就可以把渤海国历史纳入了俄罗斯-苏联史学体系；这样，就可以把渤海国的主权归属于俄罗斯-苏联。

边疆问题与国家主权归属问题密切联系。例如：苏联学者的渤海国“独立”论，把中国的渤海国从中国“独立”出来，再通过把渤海国历史纳入到俄罗斯-苏联史学体系，说明渤海国的主权不归属于唐及五代时期的中国，而归属于苏联远东地区远古的文明，即当时的苏联。那样，苏联的边疆自古以来就包括了中国东北三省东部国土。

(三) 民族文化

不同国家学者在渤海国民族文化等方面的分歧很大，这主要是不同国家学者在渤海国族属、族源问题上存在分歧。例如：现存于中国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宁安市渤海镇兴隆寺(俗称“南大庙”)内的渤海国文物石灯塔(朝鲜学者称“石灯笼”)、渤海国上京遗址出土的瓦砖，被朝鲜学者说成属于高丽文化，渤海国上京城(朝鲜学者称“东京城”)的建筑亦被朝鲜学者说成属于“高丽独特的建筑法”^②。苏联学者对渤海国持“独立”论，对渤海民族文化持“独立性”观点，是以另一种方式否定渤海民族文化系中华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

(四) 其他问题

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不同国家学者之间也存在重大分歧。如：对中国一些学者搞“东北工程”，有一些韩国学者对此加以指责。如：中国修订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也有一些韩国学者不满^③。中国学者研究中国历史问题，属于正常学术研究工作，这是毋庸置疑的。

三、理论瓶颈

笔者认为，制约渤海国深入研究的瓶颈是关于渤海国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论问题。这个问题也可以称为：理论瓶颈、理论难点。不同国家的学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立场、观点和方法不同，关于渤海国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论不同，对渤海国的某个或某些问题得出的研究结论就会不同，就会产生分歧。

(1) 渤海国研究的理论

渤海国研究的理论是学者们在长期的渤海国研究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我们可以从“学院派理论”角度，对渤海国研究的理论作继续探讨。古代学者研究渤海国基本上是以纪实手法记载渤海国的自然地理、风俗人情的，例如：中国唐代官员兼学者张建章所写《渤海记》三卷，书中“备尽岛夷风俗，宫殿、官品，当代传之。”此书虽然散失，但书中关于渤海国的主要材料和观点，在宋代欧阳修、宋祁修《新唐书·渤海传》时采用了。这种状况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变化不大。

20世纪初，在俄国“十月革命”后，渤海国研究的理论发生了重大变化——革命性的重大变化，先是苏联学者，然后是中国、朝鲜等国学者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指导渤海国研究，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运用于渤海国研究，使渤海国研究有了科学理论的指导。这里是说苏联、中国、朝鲜学者的主流研究理论。实际上，在苏联、中国、朝鲜、日本、韩国等国的学者中，渤海国研究的理论均是多元的。例如：20世纪，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以前，一部分日本学者为日本侵华战争服务，在渤海国考古和历史研究方面篡改历史，为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寻找历史根据。很明显，这种指导理论是历史唯心论，是反科学的。二战后，有一些日本学者，包括一些非专业的渤海国爱好者、研究者，例如日本新潟大学生物学教授吉田吉南先生，到中国渤海国上京遗址等地参观、考察，与中国学者探讨渤海国研究问题，了解中国学者的立场、观点，他们的研究理论与中国学者比较接近。

笔者在一些学术会议上了解到，一些韩国学者的渤海国研究理论也不完全相同。将渤海国研究的理论，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具体化，实际上就是以史实为依据，以国际法为准绳，在这个基础上，不同国家的学者探讨、研究渤海国才有一定的理论前提。若无一定的理论前提，在渤海国一些重大问题研究上存在的严重分歧将继续下去。历史不是文艺作品，要尊

重历史。渤海国时期,东北亚的政治版图是清晰的:朝鲜半岛南部的新罗王国和中国东北的渤海王国都是唐代中国的属国。所不同的是:渤海王国还是唐代中国的属州,而新罗王国不是唐代中国的属州。在7—10世纪东北亚的政治地图上,还没有俄罗斯的名字;日本与中国的属国、属州渤海隔海相望。世界政治地图在历史上发生过多次变迁,东北亚的政治地图也发生过多次变迁,今天,东北亚国家的国界基本上是国际法或者某个国际条约认可的,具有合法性。

目前,东北亚国际关系,中俄是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朝两党、两国更是用鲜血凝成战斗友谊;中韩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日是战略互惠关系。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主题。有关国家的学者在渤海国研究问题上,应将历史问题、学术问题与现实问题、政治问题相区别,以维护东北亚国际关系的大局。

(二)渤海国研究的方法论

在探讨渤海国研究的方法论时,须探讨渤海国研究的方针。渤海国研究是学术问题的研究,其方针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首先,渤海国研究在方法上应倡导多样性,可以从不同的学科领域、不同的范畴、不同的角度,分析、综合研究渤海国;可以考证、比较、批判等等。但笔者认为,渤海国研究最基本、最重要的方法是唯物辩证法,而其反面是形而上学。例如:渤海国重大分歧问题之族属、族源问题,实质上是一个民族问题,要解决这个分歧问题,就要唯物辩证地认识民族问题。今天我们说的“民族”,靺鞨、渤海也好,高句丽也好,都是古代民族,而不是斯大林所说的“现代民族”——资产阶级民族或者社会主义民族^④。古代民族和现代民族都有一个民族融和问题,还有一个民族同化问题,它是一个发展、变化的问题。可以说,渤海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渤海族是粟末靺鞨为主体,融入了白山靺鞨、高句丽遗民、汉族等形成的。到元代,渤海族融入汉族中。在当今中国,朝鲜族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56个民族之一。渤海国研究的方法论与渤海国研究的理论是紧密联系的,我们通常称其为:渤海国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论。

其次,各国学者要共同研究渤海国。其方针是:“搁置分歧,共同研究,求同存异”;其原则是:“(渤海国)主权归我(中国)”。据笔者体会,朝、韩、日、俄、美、德等国学者了解渤海国的程度、观点、研究水平差异很大,通过学术讨论、交流,让外国学者了解中国学者的渤海国研究立场、观点;让中国学者了解外国学者的渤海国研究立场、观点,十分有益。例如:1992年在“延边大学第二次渤海史学术讨论会”上,包括笔者在内的中国学者与张国钟教授等朝鲜学者在渤海国史学体系,族属、族源、国家主权归属,边疆,民族文化等重大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但会下中朝学者友好相处,有的朝鲜学者即兴表

演朝鲜歌舞,给笔者留下深刻印象。

四、突破口

既然制约渤海国深入研究的瓶颈和难点是关于渤海国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论问题,笔者认为,突破渤海国研究的理论瓶颈,首先,可以将“渤海学”作为一个切入点、突破口。

20年前,笔者在《“渤海学”刍议》一文中建议创立“渤海学”学科^⑤,探讨了“渤海学”的概念,研究对象、范畴、体系,主要内容,“渤海学”与渤海史的联系与区别等问题。

10年前,张高、赵文慧:《渤海学:新世纪渤海国研究的一把钥匙》^⑥一文,再次提出“渤海学”问题,认为:在宏观上必须较好的解决渤海国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论问题。20年来,国内、外专家、学者日益关注“渤海学”问题。例如: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张碧波先生认为:“渤海学不只是个学术问题、历史问题,它关乎着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在21世纪尤显重要。”黑龙江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朱国忱先生等亦关注“渤海学”问题。今天,“渤海学”学科建设,“渤海学”研究均取得一些可喜的成果。笔者注意到:中国学者对渤海国的研究已超出一些传统的研究领域,深入到一些比较微观的领域,如工艺美术、酿酒工艺等。在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上展出的“渤海靺鞨绣”^⑦;渤海国“贡酒”、“上京贡酒”^⑧;“贡米”“卢城稻”^⑧等。

其次,也可以将渤海文化研究作为突破口之一。由于渤海国历史文献和考古发现有限,我们可以通过渤海文化研究对渤海国经济、政治等进行逆向研究,例如:通过渤海、日本之间的文化交流,可以研究渤海、日本之间的经济、政治交流^⑨。

[注 释]

- (1)张高.渤海国研究的国际性[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2):54-57.
- (2)朝鲜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朝鲜通史上卷.第一分册[M].287-297.
- (3)赵海兵.韩不满中国修订历史[N].环球时报,2010-09-02.
- (4)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斯大林全集.第2卷,294.斯大林.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斯大林全集.第11卷,293.
- (5)张高.“渤海学”刍议[J].北方文物.1990年(1):63-67;(韩)
- (6)我市渤海靺鞨绣上海世博绽新姿[N].牡丹江晨报,2010-08-08.(韩.中考古学研究所)张高.“渤海学”刍议[J].韩.中考古学研究.1994年(1):55-61.张高、赵文慧.渤海学:新世纪渤海国研究的一把钥匙[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2000(1):50-51;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魏晋南北朝隋唐史.2000(4):61-63.
- (7)民族文化上京“现奇葩”[N].生活报,1999-02-05;光大民族文化[N].牡丹江日报,1997-09-08.
- (8)钟兴.尚食尚品.广告[N].牡丹江晨报.2010-11-23.
- (9)张高.文化因素与渤、日关系史研究[J].日本研究(93,中国东北与日本国际学术研讨会专辑).1993(4):45-48.

[责任编辑]心安